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著作丛书

赤字中的民主

〔美〕布坎南 著
瓦格纳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著作丛书·

赤字中的民主

—凯恩斯勋爵的政治遗产

詹姆斯·M·布坎南
〔美〕理查德·E·瓦格纳 著

刘延安 罗光 译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88·北京

James M. Buchanan and Richard E. Wagner
Democracy in Deficit: The Political
Legacy of Lord Keynes

Academic Press, INC. 1987

Chizi Zhong De Minzhu

赤字中的民主

〔美〕詹姆斯·M.布坎南 理查德·E.瓦格纳著
刘延安 罗光 译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红庙)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永乐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25印张 160千字
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0 001—9 000

ISBN7—5638—0015—8/F·15

定价：2.30 元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著作丛书》

编辑委员会

顾问	厉以宁	宋承先	张培刚	胡代光
	钱荣堃	高鸿业	黄范章	谭崇台
主编 编委	贾湛	梁小民		
	于同申	马在新	甘华鸣	厉以平
	吕立勤	李玉臣	李盛平	余永定
	张家慈	沈志华	邹蓝	吴衡康
	杨河清	杨德明	俞品根	施炜
	彭元	彭剑锋	薛进军	

编者献词

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界介绍了不少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的著作，对我国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起了积极的作用。为了使这种介绍更具有全面性和代表性，我们决定系统地翻译出版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的主要著作，作为翻译丛书奉献给广大读者。

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当今世界上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奖。它是1968年瑞典中央银行在其建立300周年时为纪念诺贝尔奖提供者而设立的基金，全称是“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该奖由瑞典皇家科学院委任组成的“经济科学委员会”评定。从1969年起在每年的10月中旬与其他各项诺贝尔奖同时公布，到1987年为止已颁发19届，共有欧美的25位经济学家获奖。获奖的经济学家们的经济理论基本上代表了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成就，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读者通过这些著作能全面、深入、系统地了解和研究西方经济学，从中吸取对我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学发展有价值的东西。

当代西方经济学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数学方法的应用。经济学要反映经济中的数量关系，因此，经济学与数学早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从17世纪起经济学家就用数学公式来表述经济理论。本世纪以后经济学家又把经济理论、数学和统计学结合起来建立了经济计量学，用于解决实际问题，并取得了重要进展。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经济学的数学化是经济学精密化、实用化的标志。在获奖的经济学家中，有三分之一以上在这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获得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挪威经济学家R.费瑞希和荷兰经济学家J.丁伯根是经济计量学的创立者。以后获奖的美国经济学家P.萨缪尔森、K.阿罗、W.列昂惕夫、T.库普

曼、L.克莱因、G.德布鲁，英国经济学家J.希克斯、苏联经济学家L.康托洛维奇都在经济学数学化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流派林立的当代西方经济学中，新古典综合派是公认的“主流派”。这一派继承并发展了凯恩斯主义，对西方各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理论都有重大的影响。因此，在获奖的经济学家中属于这一派的有相当比例，如美国经济学家P.萨缪尔森、L.克莱因、J.托宾、F.莫迪利亚尼、R.索洛，都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

70年代后西方经济政策与经济理论的显著变化是自由主义的影响日益增强。代表自由主义的奥地利经济学家F.哈耶克，美国经济学家M.费里德曼、G.斯蒂格勒、J.布坎南先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便反映了这种趋势。

经济学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科学。因此，获奖者中还有一批对解决各种实际问题作出贡献的经济学家，如：美国经济学家S.库兹涅茨和英国经济学家R.斯通对国民收入统计作出开创性贡献；美国经济学家A.刘易斯和T.舒尔茨对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有独特贡献；瑞典经济学家B.奥林和英国经济学家J.米德对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关系问题作出重要贡献；美国经济学家H.西蒙对管理科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本丛书的选编以获奖者的代表作，特别是在西方经济中影响重大的名著以及对我国经济改革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有启发和借鉴的著作为主，每位获奖者的著作至少选一本，以保持其系统性与代表性。

还应该说明的是，西方经济学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获奖的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学者，因而在这些著作必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在阅读时我们应注意这一点。但是，西方经济学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之一，有其不可忽视的精华，资产阶级学者对经济问题的研究有其可取之处。从这种意义上说，只要我们以分析的

态度认真阅读这些著作，必将得到许多有益的收获。

本丛书的编辑出版得到了老一代学者与中青年学者的关心与帮助，谨向关心与帮助这套丛书编辑出版工作的所有朋友表示感谢。

编 委 会

1988年4月

译者的话

詹姆斯·麦吉尔·布坎南是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他1919年出生于美国田纳西州，1948年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曾先后在田纳西大学、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任经济学教授，并担任过美国经济协会副会长、西方经济协会副会长等职，现任弗吉尼亚州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

布坎南是公共选择学会的创建人之一，一直从事教学和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工作，对发展经济与政治决策的契约与法制基础的研究将近40个春秋，被誉为“公共选择理论之父”。他运用经济方法去分析政治决策过程，对政治决策、政治家和选民的行为进行研究，提出政治家要应付各方面的压力并希望再次当选，以致政府的行为常常是创造或夸大市场的不完善，而不是去克服它，因此对政府的行动要加以限制。他对公共选择的一般理论、福利基础、一般规则，以及社会法规制度的形成、政府对社会契约的违反、法制法规的重新确立等问题提出了系统的和独到的见解，因而创立了公共选择理论，并使公共选择理论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即“公共部门经济学”。由于布坎南对政治决策与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作出了贡献，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授予他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金。

《赤字中的民主》一书是布坎南和理查德·瓦格纳合著而成的。作者遵循其公共选择理论的一贯逻辑，对凯恩斯主义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对以政治决策结构分析为基础的凯恩斯宏观经济政策和后凯恩斯公共债务理论进行了批判性分析，论述了政治结构对经济理论的影响和经济政策的决定对政治结构的影响。阅读本

书，将加深对布坎南公共选择理论的理解，并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本书由何宝玉同志进行了译文校订，李华同志负责翻译了第12章，在此向他们表示谢意。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书中疏漏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请读者指正。

刘延安 罗光

1988年4月于北京

作 者 序

凯恩斯的经·济·学已经在普及性刊物、初等教科书和高深的论文中得到了全面的论述。相比之下，对凯恩斯和凯恩斯主义的政治学的论述却是粗略的、间接的，如果不是毫无研究的话。这一点是很令人吃惊的，特别是考虑到越来越多的证据倾向于支持通过基本的分析而得出的假设。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弥补这一缺陷，至少要达到引起理论界进行一场对话的程度。我们将大胆提出自己的观点，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核心目的就是要对凯恩斯主义的各个方面进行批判性分析。那些感到有责任对我们的经济-政治现实的习惯判断作出回答的人，就一定会重视这些遗留下来的迄今未作探究的问题。

本书所关心的问题，首先是论述经济思想对政治制度的影响，其次是论述由此产生的制度变化对经济政策的决策造成的影响。这种探讨必须与描述传统的规范经济学的做法有所不同。至于后者，经济学家按照他们所喜欢的或乐观的结果提出政策的建议和意见。他并不通过政治选择程序来干扰建议的传输。他也不考虑其规范性的建议对基本政治制度产生的潜在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对它所带来的结果的反作用。等到出现了一系列事件迫使他不得不承认观念对制度以及制度对观念所产生的上述影响的时候，正统经济学家就会责备公众和政治家未能看清制度的模糊性。不管他们是否这样做，公众都“应该”象经济学家那样去观察生活。

我们不接受这种闭目不见的方式。我们回顾一个阶段，试图伴随着经济发展的进程来考察政治。我们着眼于政治经济。在对凯恩

斯学派关于经济政策的教条作出反应时，已经形成的习惯判断便暗含着政治结构的弊端。我们的特定前提是，凯恩斯学派的经济政策理论在运用于政治民主制度时产生了固有的偏见。如果这一前提被接受，进一步的探索就应该集中于如何改变制度结构。在现行制度约束下政治家们将如何行事？在对此提出预言之前，我们打算向他们提出新的建议。必要的话，在开始为制度改革提出建议之前，我们要建立一套政治生活如何运行以及公共选择的实证理论。

在我们成熟的观点中，历史的记载证实了我们分析中的基本假设。据此，我们发现，把观念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对制度产生影响作为本书的第一部分是合适的。尽管如此，我们应该强调，接受我们的基本分析并不需要用我们的术语来解释财政历史。那些天生具有不同癖好的人会从不同角度来解释所观察到的历史纪录。同时，他们认为，我们的分析把偏好排除于财政决策过程之外。从这个观点看，偏好比现实更有潜能。

有些人认为我们的论述过于危言耸听。我们希望事实证明这些论断的正确性。我们对变革的方向和速度都很失望。然而我们不是宿命论者。在写作本书时，作者确信美国人民有能力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们希望，我们的逻辑推论的结果实际上不会发生，有条件的预言将被驳倒，制度将会改变。确实，我们愿意把本书作为一场对话的先导，这场对话将会间接地导致更有实证性的辩论的失败。我们提出了自己对凯恩斯主义和民主价值的看法，并希望一个世纪之后我们的后继人将会把20世纪中期看作是背离基本经济社会稳定状况的一个小插曲和一段危险的弯路，这种稳定状况是美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生活的必要部分。

我们的分析仅限于凯恩斯学派的思想对美国政治决策结构的影响方面。严格地说，副标题中的“政治遗产”应该冠以“美国的”一词。我们不想把凯恩斯学派对其他国家特别是英国的政治历史的影响也进行讨论，这种讨论本身无疑也是很有价值的，比

较的结果也很有启发作用。但是，象这样扩大讨论的范围是其他教科书的任务，我们只把论述明确地限定在我们最熟悉的政治经济方面。

目 录

译者的话	(1)
作者序	(1)
I 发生了什么事	
1. 凯恩斯做了些什么	(3)
2. 古典的财政教义	(10)
3. 第一步 学者	(23)
4. 新教条的传播	(36)
5. 功与过的评价	(54)
II 出了什么错	
6. 哈维·罗德的设想	(77)
7. 民主政治中的凯恩斯经济学	(91)
8. 货币平衡的赤字和政治民主	(105)
9. 制度限制和政治选择	(124)
III 能做什么事	
10. 可选择的预算原则	(149)
11. 充分就业代表着什么	(163)
12. 财政原则的复归	(175)

I 发生了什么事

1. 凯恩斯做了些什么

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亚当·斯密就指出：“每个私人家庭的节俭行为，在一个国家也是可能做到的。”直到本世纪中叶发生了“凯恩斯革命”，美利坚合众国的财政管理才从斯密的财政责任原则中受到启示：政府不征税就不要支出；政府不应该为了给人们带来暂时的短期利益而在公共支出中推行赤字财政，使后代受到赤字的严重束缚。

随着凯恩斯主义革命的完成，这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财政责任原则便让位于那些“灵丹妙药”，即曾经受到抑制的政治性财政活动。凯恩斯主义战胜了斯密的理论，关键就在于强调了家庭与国家的区别而不是强调其相似性，特别是注意了有关节俭财政管理原则的问题。国家不再被想象为是和家庭一样的概念，节俭的财政行为规则在国家与家庭之间应该有显著的区别。凯恩斯主义的宗旨也许可作这样的概括：私人家庭的愚蠢行为，也许正是处理国家大事的精明行为。

“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这是60年代人们颇为熟悉的口号。这个口号是象米尔顿·弗里德曼这样的院士和里查德·尼克松这样的政治家们提出来的。但仍然还没有科学的天才可以证明我们是生活在经济的乐园。在凯恩斯主义盛行的20世纪60年代后期，我们穷于应付持续增加的预算赤字、迅速膨胀的政府部门、高失业率以及与此相伴随的对美国社会政治秩序的幻想。

事情并不象想象的那样。1963年是沃特·海勒的鼎盛之时，从这年之后，财政上的聪明做法终于战胜了愚蠢荒唐的做法。国

民经济稳定下来了，或者说，接近了稳定的增长潜力，向着好的方面发展，无论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都是如此。乐观主义精神确实是相互感染的，结果，斯普特尼克和艾森豪威尔后期宣布的经济生产率和增长率目标立即被放弃，被莱顿·约翰逊的“大社会”方案的再分配主义者们的热情和拉尔夫·纳德、希拉·克拉勃、康芒·考斯的零值增长思想，以及艾德蒙·穆斯基的环境保护机构取而代之。在掌握了国民经济的管理权之后，政策设计者们便转向了生活质量问题。“大社会”变成了现实。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为什么兴盛时期会走向衰落？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不能永远用来解释一切。智慧上发生了很大的错误，并且不单单是一个普通的政治家所为。有很多经济学家也犯了错误。

必须对过去学术上的混乱承担实际责任的正是凯恩斯勋爵本人，他的思想被美国的权威经济学家们不加批判地接受了。对这些思想的影响在不断增加的历史证据面前，再也不能继续忽视了。凯恩斯经济学导致了政治家的过度自由，它摧毁了对政治家正常欲望的有效约束。用凯恩斯主义武装起来的政治家能够大肆花费并不因急需征来的税金。“赤字中的民主”既描述了我们的经济困境，也说明了本书的主要内容。

政治经济学

这本书与其说是一本经济理论著作，倒不如说是一篇政治经济学论文。我们把焦点对准了实现经济政策的政治制度。政策本身最终来源于好的或者坏的理论。我们讨论的中心是这样一个原则：好的理论需要同社会的政治制度相联系。一个极权主义政权的理想的、规范的经济管理理论可能完全不适用于另一个所有被管理者都积极参与的政权。经济学家们从来都没有正确地认识到在社会的基本政治结构和政策决策的经济理论之间存在的必要的联